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赵立彬
编

黄文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赵立彬
编

黄文
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黄文山卷/赵立彬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0-17576-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黄文山 (1897~1982)-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7888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黄文山卷

赵立彬 编

Huang Wensh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3 000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规模宏大而方向各异的重重大变迁。从早期冲决旧思想的网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澎湃涌入、叠彩纷呈，到 1920 年代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民族主义高扬、意识形态统制强化，新知识界的人士难有不受这些时代潮流的影响。黄文山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和知识变动格局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较早受到西方新思潮的熏染，与早期共产党人、国民党人都有一定历史渊源，经历过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社会交往广泛，学术领域广阔。他是一位在时代思潮中相对活跃的思想家和学者，对现实问题又非常关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代表国民党官方政治立场、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服务，同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在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实际工作，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

黄文山（1897—1982）^①，号凌霜，笔名兼生、兼胜等，广东省台山县人。出生于台山县洞口乡长兴里。幼时跟从其四叔祖黄充文学习旧

① 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0 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关于黄文山的生年，有 1897、1898、1900、1901 年等各种说法，较早出版的日人桥川时雄所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黄文山”条目下记载为 1897 年，所本不详（桥川时雄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社，1940）。黄文山的两位友人：谢康 1969 年记到该年黄文山 71 岁（谢康：《黄文山先生的“书”和“人”》，《艺文志》第 48 期），卫惠林曾在 1978 年记到该年“正值文山兄八秩大庆”（黄文山：《黄文山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此，黄文山应生于 1899 年（若以中国传统计龄习惯）或 1898 年（按实岁计）。

学，后入广州千顷书院肄业。1911年，因为其父亲黄世河在港经商，便转学于香港皇仁书院。四年后（1915年），赴上海考取清华学校，到北京求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①

黄文山在求学时期，对于新思潮就情有独钟，对新世界和新思想十分向往，并很快感知新思潮的影响。在香港读书的几年里，他便组织世界语学会。年轻时受师复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已经很深，并参加了师复组织的“心社”。到北京后，迅速接受“人道主义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在北京大学时，他又与赵太侔等组织“实社”，主编不定期刊物《自由录》，以凌霜为笔名，自是凌霜为其别号。这一刊物在思想上承接巴黎《新世纪》，以激进著称。黄在北京时受蔡元培影响至深，五四运动爆发，黄文山由北大学生会选举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总编辑，同时又为《新青年》杂志撰译。五四运动后，黄文山与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在联络建立北京、广州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20年9—10月，一度加入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参与《劳动音》周报的主编工作。^②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思想倾向激进。

1921年黄文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应广东机器工会领导人马超俊邀请，代表广东机器工会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劳苦大众大会”^③，即1921年底共产国际决定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苏联文献称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有3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共党员张太雷、邓培、张国焘等10人，国民党党员张秋白等10多人。在回国路时，黄文山执笔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陈独秀把它公开刊登于《新青年》杂志上。信中黄文山表示认可“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④

但是黄文山并不认为这封通信代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看法，很快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此后，黄文山主要转入学术研究。1922年夏，黄文山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及克拉克大学，专攻社会学、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1928年得哥伦比亚大学

① 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0页。

② 参见黄尊生：《记黄文山先生》，张益弘主编：《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2页，台北，中华书局，1976。

③ 同上书，3页。

④ 参见凌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致陈独秀函》，载《新青年》第9卷第6号。

硕士学位。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精研三民主义。1928年,黄文山由美赴欧,经历欧洲各国,返抵上海,出任劳动大学教务长,后任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至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兼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黄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局势稳定后,又赴南京改任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获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36年两广事变后,黄文山到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时黄不仅在学术上已经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一些职务,直接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南下广州后,先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市立第一中学校长。抗战爆发后,复兼《广州日报》社社长,创办《更生评论》等政论性杂志,组织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民族文化》月刊。^①1939年至1941年间,奉派赴美国视察党务侨务。1941年出任立法委员。1945年8月,任广东省府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同时黄文山仍有学术界的任职,1941年5月,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复员广州,同时原广东省立勤勤大学法商学院发展成为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创办社会学系,黄文山接任院长兼系主任。在1946—1949年,他为推动广东的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开展过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使在华南建设学术中心的工作颇有声色。

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大陆解放。黄文山继续在海外为国民政府效力,1956年在洛杉矶出版中英文《华美周刊》,1961年在洛杉矶创办“华美文化学院”,以保存及阐扬中国文化并促进东西文化之交流与混融为目的,讲授东方文化哲学历史艺术的课程,自兼院长。并继续担任台湾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驻美文化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应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之聘,为客座教授,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及考古人类学系。1970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客座教授一年。聘期完毕,又应香港珠海书院之邀,留港讲学,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后因肾病施行手术,1973年夏,辞退香港职务,返回美国,任洛杉矶东方大学研究院院长及教授。1982年6月20日在洛

^① 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2页。

杉矶逝世，葬于玫瑰坟场。^①

黄文山在台、港和海外有较大的影响^②，大陆学术界对黄文山的研究，过去多在论述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对“黄凌霜”之名有所提及，专文不多。阮青曾撰有《黄凌霜》一文，作为《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之一，对黄氏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有初步的介绍。^③黄兴涛在提议开展“文化学”的学科与理论研究时，特别注意到黄文山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指出黄文山称得上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明确的文化学方法论意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化学的先驱人物。^④作为学者的黄文山，近年来有蒋志华、钟少华、田彤、黄有东及笔者作过探讨性的研究。^⑤

二

黄文山既是一名思想家，又是一名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与他的学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思想上，黄文山受到20世纪初以来主要的思想大潮所影响，早年主张无政府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了解，后来更是亲身参与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民族主义、中西文化观、文化政策等方面都深深带上了国民党党派学者的印记。在学术上，黄文山涉猎的领域颇为宽广，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

① 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7页。

② 1976年，张益弘主编了《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一书，其中收录对黄文山生平的一些回忆、对黄文山著述的介绍和对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的心得。有关黄文山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可参阅该书。

③ 参见李振霞、傅云龙编：《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④ 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氏著《文化史的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⑤ 大陆学者的研究，主要有蒋志华：《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瞥》，载《广东社会科学》，1997（3）；钟少华：《中国学的文化创建者黄文山》，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2）；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赵立彬：《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载《暨南学报》，2004（6）。黄有东对黄文山有系列的研究，如：《黄文山文化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黄文山与“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载《燕山大学学报》，2008（3）；《黄文山与现代“文化学”》，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5）；《中国现代“文化学”双峰：黄文山与陈序经之比较》，载《理论月刊》，2010（7）；《民族本位·中庸型文化：黄文山的“文化出路”观述论》，载《现代哲学》，2010（4）。

学等领域都有相关著述和译述，特别重要的是，黄文山有着强烈的创立“文化学”的学术理想，将“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倡导，并努力开展学科构建的实践，从而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转型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早期黄文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承袭师复的主张，和区声白等人以社会主义学派自居，反对强权和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以公有制度作为他们的理想社会，主张政治生活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和团体主持，社会平等，个人独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黄文山将社会主义分成无政府主义的“共产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产社会主义”，极端反对后者，并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倡“无政府共产党”的“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的主张。这一时期，黄文山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实社《自由录》、《新青年》、《进化》、《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扬无政府主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文山何时告别无政府主义，未有可靠的材料说明。但他很快从文化的视角，对世界视野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有所修正，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显示出与国民党的思想观念日益接近，先后任纽约《民气日报》总编辑和旧金山《国民日报》总编辑，阐扬三民主义理论。留学回国后，国民党已经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黄文山在国内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均与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有密切关联，转而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阐述其文化观，不仅理论上发生了完全的转变，而且前后时期发表的文字在风格上都截然不同，判若两人。1932年1月，黄文山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出版的机关刊物《中央导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文化改造》一文，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出发，阐述其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就是要建立新的文化系统。革命是实行的文化变革，“革命是文化转向的唯一因子”。“中国今日的民主革命是拼命的飞跃，社会生产诸力的进展，文明的演进，都系于这个飞跃的能否成功。”^① 1935年初《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时，黄文山是署名者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中

^① 黄凌霜：《中国革命与文化改造》，载《中央导报》第23期，1932年1月。

央政治学校教授萨孟武、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武培干四人都是后来被拉进来参加签名的。^① 但这篇宣言的观点，确实代表了黄文山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出路的答案。宣言发表后，引起激烈讨论，批评者甚众，黄文山认为大多数人对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理解，都离开宣言的本意，是一种“曲解”。尤其对于论战中批评本位文化宣言有“复古”倾向、主张对西洋文化应该全盘接纳的胡适和陈序经，黄文山认为“实在不甚妥当”^②。黄文山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来求答案的，中国文化的改造，要改造基本精神的方面，以家族伦理为根本的中国传统制度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化必须改造。其途径，便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黄文山此后更为积极地参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抗战爆发后所创办的《更生评论》周刊，以宏扬“抗战建国”之国策为主要目的，另组织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民族文化》月刊，也以发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主旨。^③ 黄文山在《更生评论》、《时代动向》、《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山文化季刊》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对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宣传工作十分积极，并大力倡导符合国民党文化控制政策的“文化统制论”，认为在这种文化的转型时期，“一切文化之统制的变易，有赖于理论的文化学与应用文化学，为之指标，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可致疑者”^④。从配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到鼓吹“精神力之统制”，直到晚年倡导中国文化复兴，黄文山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化学”的著述，而在政治上都是与国民党的文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时，本身处于中西文化选择的矛盾之中，虽然在思想的深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至深，在西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西方文化或将中国文化地位估计过高，但实际上已暗含文化自大的基因。后来黄文山晚年再谈及中国文化复兴时，便又将中国文化凌驾于世界文化之上，不为无因。

黄文山的中西文化观以及他对国民党文化意识形态的拥护，是以他的“文化学”学理为基础的。黄文山是近代中国“文化学”学科建构的

① 参见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发表经过》，载《政治评论》第 8 卷第 11 期。

② 参见黄文山：《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文化学论文集》，154 页，广州，中国文化学会，1938。

③ 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2 页。

④ 黄文山：《文化学论文集·自序》，《文化学论文集》，6 页。

主要倡导者之一,“文化学”也是他一生最重视和用力最多的学术事业。自1920年代末,黄文山已经开始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是1921—1922年的苏俄之行,在经过乌拉尔山脉时,“目击欧罗巴和亚细亚分线的碑记,对于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的问题,在心影上便留着一个不可磨灭的印痕”^①。1930年代中期,他在“文化学”的倡导上取得重要进展,在他任教的各校中,“颇以文化学相号召”^②,试图应用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研究文化现象,建立“文化学”作为一门“纯粹的、客观的”并且是综合了其他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学科,以解决关于文化的重大问题。除在《新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丛刊》等杂志上发表提倡“文化学”和阐述“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文化法则问题的论文外,1938年,由中国文化学学会在广州出版了他的《文化学论文集》,收录了他关于“文化学”学科的概念、文化法则、“文化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文章。1940年代,黄文山致力于《文化学体系》的著述,但直到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全书并未完成,只有《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章,篇幅较紧,曾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别印专刊。抗战后的一段时期,黄文山的“文化学”相关著述发表较多,一些新的论文或经过修订后的重要论文,如《文化学的建立》、《文化体系的类型》、《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等分别在《社会科学论丛》、《社会学讯》上发表。1968年,黄文山在台湾出版了约70万言的巨著《文化学体系》,全书共分三篇十九章:上篇:文化学的建立;中篇:文化体系的分析;下篇:综合观察。除下篇成书于1960年代外,上两篇均为1949年以前所作。由于黄文山“用文化学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论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一切”,因而后来有研究者提出,黄文山的“文化学”是一种“文化还原论”或“文化归因论”,即用“文化学”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论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一切,因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③。

在“文化学”研究的统领下,黄文山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产生

① 黄文山:《文化学的建筑线》,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

② 黄文山:《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载《社会学讯》第8期,1948年12月19日。

③ 顾晓鸣:《追求通观:在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的交接点上》,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了一定的影响。从1920年代始,黄文山在广泛接触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论文,编撰了《社会进化》、《西洋知识发展纲要》等著作,对于西方相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3年2月,黄文山等人参与创办了一个“中华社会科学学社”,黄文山是三名常务理事中的一员,负责编辑期刊工作,同时担任社会组兼史地组组长。这个团体所主办的期刊,就是《新社会科学季刊》。^①1934年,黄与何联奎、孙本文、凌纯声等一起筹设“中国民族学会”。^②1946年4月,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成立,主要由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岭南大学三校社会学系人员组成,黄文山任理事长。^③抗战时期,他在《民族学研究集刊》、《青年中国季刊》发表了多篇与民族学有关的论文,他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领域颇有声名。史学也是他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就其个人的史学实践,曾经因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发表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的看法,并引起过商榷,相关文字(包括他人的商榷文字)都发表在1934年和1935年《新社会科学季刊》上。^④1930年5月,黄文山在东南社会学会(后为中国社会学会)主编的《社会学刊》上,发表《史则研究发端》一文,论述了自己对于历史法则的认识。^⑤1934年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主编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民生史观论究》一文,主要围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进行了阐述。^⑥这两篇文字具有密切的关联,1935年,黄文山以《民生史观论究》的内容为主体,将《史则研究发端》的一部分,作为《由史的“偶然论”说到史的因果法则》一章,并补写了《史的唯生论的方法论》一章,合为一体,撰成《唯生论的历史观》一书,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1937年初,黄文山又在自己于广州主办的《更生评论》上发表《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一文。^⑦黄文山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知

① 参见《中华社会科学学社社务报告》,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

② 参见何联奎:《自述》,《何联奎文集》,406页,台北,中华书局,1980。

③ 参见《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成立经过》,载《社会学讯》第1期,1946年5月20日。

④ 参见黄文山:《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之检讨》,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4年11月15日;《阶级逻辑与文化民族学》,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5年3月15日。

⑤ 参见黄文山:《史则研究发端》,载《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5月。

⑥ 参见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号,1934年8月。

⑦ 参见黄文山:《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载《更生评论》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